

书人茶话

# 自此，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

■ 王文

全球化，是近几十年来热度不减的世界性话题。全球化这个概念渐渐进入公众意识后，大到国际事务，小到家长里短，都能被平民百姓用国际视野来打量一番。只是，我们在谈论全球化时有没有想过，这个世界由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前行成一个整体，究竟始于何时？“就中国学者对世界近代史的通常理解而言，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即是自约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这段历史的开启是与世界地理大发现密切相关的；自此，世界开始由分散走向整体。”这篇题为《何为大同？——基于边疆民族史与全球史的考察》的论文中，作者林日权的这一观点，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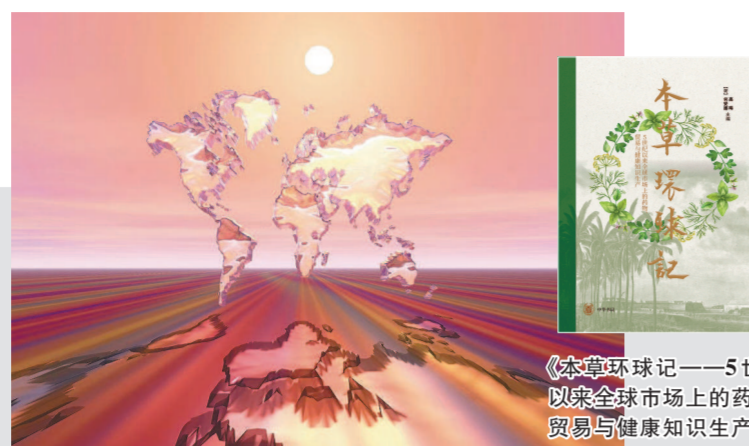
## 不胫而走的本草联结起了全世界

这篇论文被收进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晔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安娜联合主编的《本草环球记——5世纪以来全球市场上的药物、贸易与健康知识生产》中，该书共收论文16篇。这些以本草为核心的历史学论文，分别论述了阿魏、“中国根”大黄、丁香、北美人参等本草从原产地走向世界的契机，在异国他乡的“命运”，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受益于同一种植物而使得彼此间的交流变得顺畅和频繁起来，始于本草的贸易也越来越繁荣，原本互不相干的地区、国度，连成了片。

以该书编者之一高晔撰写的《“中国根”的知识考古——16世纪欧洲医生视阈下的异域新药》为例。从1545年冬天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遭受人生第11次中风袭击破题的这篇论文，用翔实的史料告知读者，查理五世的病痛是怎么被“中国根”缓解的。那么，名之为“中国根”的这味显然是来自中国的本草，究竟是哪种植物？高晔以“中国根”的知识考古”为小标题，论证了这是一种蒺藜类植物根茎，在16世纪中期被深受阿拉伯波斯医学影响的欧洲医生带到了欧洲。问题是，生长在五世病痛的根茎究竟姓甚名谁？高晔追溯后发现，西文原典里“中国根”所指的植物颇有不同，土茯苓、藜藜、冷饭团、草薢等都有可能。面对难解的“中国根”之谜，高晔却兴奋地认定，越是这样越能证明16世纪时已有多种中国本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欧洲。而从1546年8月瑞士巴塞罗纳的拉丁文版的《中国根书简》中，可以基本确定“中国根”为土茯苓。这本书信集是与哥白尼齐名的维萨里所著，该书共计出版了拉丁文、法文、荷兰语、德文、西班牙语、英文等13个版本，由此可见，彼时，“中国根”已传遍欧洲，其药用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旅行者也好，商人也罢，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自己逗留中国期间见识了土茯苓的疗愈效果而将其带出中国，带到回家路上途经的每一个停留处，直至带回家乡的举动，让一味能治病救人的中国本草黏合起了原本老死不相往来的几方土地。

与此同时，原产中亚的阿魏也进入了中国、印度、欧洲等地的药典；中国大黄、黑海南部大黄、巴比伦大黄等，虽因产地不同而药性略有差异，但不胫而走的大黄们总有在世界某地交集的足迹，它们在药性上表现出来的各自的优势使得大黄在16世纪成了世界性话题；至于书中所论及的丁香、北美人参、金鸡纳等本草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繁忙图景，更是印证了林日权在其论文起始段落说的那句话：1500年以后，世界开始由分散



图源：视觉中国



图源：视觉中国

走向整体。本草的全球环游则对这样的世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由名著连接起一个虚拟但结实的文学世界

全球本草大流通促成了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药材贸易。只是，当这些草药贸易商在异国他乡忙于生意之余，会不会顺便关注起别国的文化？比如，习惯于用羽毛笔横着书写罗马字母的欧洲商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偶然看见当地人用毛笔竖着书写方块字时，会不会好奇心使然地带一本中国书回家？假设应该是成立的。君不见，各种文字的书籍在各地的流转催生了一种职业——翻译。

自从地球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学成为一种世界共识后，不知道有多少专业人士前赴后继地试图将世界文学联结成一幅完整和完美的文学地图。无奈，记载人类丰富且多样情感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环球文学史”因此总也画不上句号，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读到的世界文学史，读不上完整，只能论特色。

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大卫·丹穆若什的这本《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就是一本非常有特色的环球杰出文学作品大展示。

2020年春天，疫情在美国暴发。丹穆若什计划中的会议和旅行演讲全部取消。只能坐在家中喝咖啡的教授，想到了儒勒·凡尔纳。爱好科幻小说的读者都知道这位法国人的代表作是《八十天环游地球》，可又有谁知道，凡尔纳漫长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出过巴黎。凡尔纳可以坐地漫游世界，我们为何不能在不间断足的情形下进行一次世界文学之旅呢？——我邀请读者和我一起在网上旅行16个星期，从2020年5月到8月，我们每周一一起通过阅读五本书来探索一个尘世中的地点。”

计划很快兑现。丹穆若什带领他的读者从伦敦出发，经由巴黎、克拉科夫、威尼斯—佛罗伦萨、佛罗、伊斯坦布尔、马斯喀特，再到刚果、尼日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德黑兰—设拉子、加尔各答、上海—北京—东京—曼谷，再到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危地马拉、安的列斯群岛、巴拿马，最后抵达终点纽约，跟着文学完成了一次世界环游。

这次文学环游很快变成了一本新书：《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拿到书的简体中文版后，我按照自己的阅读习惯扫了一眼目录，发现丹穆若什认定可作为世界文学史里一个篇章的文学作品中，果然有不少是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世界名著，如但丁的《神曲》、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鲁迅的《阿Q正传》、紫式部的《源氏物语》、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等。但是，将

罗伯特·麦克洛斯基的《缅甸的早晨》和休·洛夫廷的《杜立特医生历险记》两本童书也归入其中，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为了寻求答案，特意找到被译成《海边的早晨》的《缅甸的早晨》和被译成《杜立特医生的马戏团》的《杜立特医生历险记》拜读了一下，写给孩子阅读的简单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也就是说，阅读视野非常广阔的丹穆若什教授选书的标准有其独特性，他得思忖，所选之书是否能帮助读者直面人生困惑，毕竟，这是一本在特殊情况下诞生的世界文学读本。

该书的策划和中文编译宋明伟在中文版序中这样写道：“这个环游地球计划的世界性，还体现在从第一周开始，已经有多种语言的翻译也同步进行，这包括阿拉伯语、土耳其语、罗马尼亚语、德语以及中文的翻译。”疫情虽然能暂时绊住人们走向世界的脚步，却无法隔绝有着相同喜好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心心相印。在丹穆若什教授的创意下，借助互联网，那些诞生于不同国度的名著以其特有的温度将世界连接成了一个虚拟但结实的文学世界。

## 地球上的每一个村落都不会永久孤独

以艺术、设计和旅游为创作母题的伦敦作家约兰达·扎帕特拉见多识广，《400个环球艺术之旅》是她已出版的30多部作品中的一本，仅是书里的照片，就能估摸出她丈量世界的路程有多长。

书名中的“400”，不是虚指。这趟从北美洲启程的艺术之旅，途经南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最后抵达大洋洲，作者从各大洲各个国家精选出来的400个向公众开放的艺术场馆，每一处都足以勾起我们背上行囊出发的欲望。虽说1500年以后世界才由分散走向整体，但是，地球上有了人迹以来，我们的祖先一直在以他们的方式呼唤着彼此。

1994年在法国阿尔代省肖维岩洞里发现的岩画，有着三万多年的历史，岩画所表现的“不仅有其他地方发现的为人熟知的食草动物，比如野牛和马，而且还有食肉动物，比如洞穴狮子、黑豹、熊、洞鬣狗，甚至据说还有犀牛”。旅行一路向前，“阿尔及利亚撒哈拉沙漠东南部的一个幅员辽阔的高原上，遥远的塔西利·恩·阿耶的15000幅岩画多少有点低调而又神秘……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观，到处都是几千年或一万年前的作品。这里包括羚羊和鳄鱼在内的野生动物形象，还有抽象的几何图案、神话生物和展示各种动作的人类……”与肖维岩洞里的岩画相比，一两万年前的人类以岩画为手段表达诉求的内容虽然丰富了许多，但用岩画求得呼应，似乎成了史前人类共同的手段。尤其是艺

术之旅行进到澳大利亚境内后，岩画几乎成了一些著名景点的标志性景观，像在西澳大利亚的穆鲁朱加国家公园、北领地的卡卡杜国家公园、昆士兰州的昆坎村、维多利亚州的格兰屏国家公园、新南威尔士的库里盖狩猎地国家公园等景点里，都能看到岩画，岩画的内容包括鸟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海洋动物、身着精致服饰手拿回旋镖或长矛的人物形象等，无不展示着澳大利亚土著的状态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联想到我国境内的贺兰山岩画，那些分布在贺兰山峡谷溪道两侧、绵延800多米的山岩崖壁上总数多达6000余幅的岩画，非常真实地记录了3000至10000年前远古人类的生活画面。

这些岩画告诉我们，自从这个星球上有了人类，先民们寻找共同的律动以求携手共进的努力，从不曾停歇过。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籍，而第167页上的那张照片，显得尤其沉郁。照片的下方，是加黑加粗的标题：“在维也纳回顾20世纪奥地利的黑暗历史”，细读文本，我们得知知道，在周边米色住宅俯瞰下的形似防空洞出入口的建筑，是英国雕塑家雷切尔·怀特瑞德设计的大屠杀纪念碑，纪念在“二战”中惨遭杀害的65000名犹太裔。这座坐落在犹太会堂遗址上的纪念碑又被称作无名图书馆，因为，纪念碑的主体建筑是成千上万本书脊朝内、码放整齐的无名书脊。

读到这张照片时，我想到了大卫·丹穆若什在《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的第二章《巴黎：作家的乐园》和第三章《克拉科夫：奥斯维辛之后》提到的几本书，它们分别是乔治·佩雷克的《W或童年游戏》、普利莫·莱维的《元素周期表》和保罗·策兰的《诗选》。“在二战”中失去双亲的乔治·佩雷克，以两个文本交替叙事的方式结构出了一本《W或童年游戏》，这本模糊了纪实与虚构界限的小说，虽无一字直写战争，却将“二战”对作者、作者家人以及周遭的戕害，用冷静的语调表述得异常残酷；相比之下，意大利化学家普利莫·莱维揭露纳粹集中营罪恶的小说《元素周期表》的知名度要高一些；至于保罗·策兰的《诗选》，“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喝呀喝/我们中午喝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我们在空中握个坟墓躺下不拥挤……”选自策兰一首名为《死亡赋格》的这几句，将战争带给诗人的黑不见底的记忆，表达得令人震撼不已。假如雷切尔·怀特瑞德要在他的作品上标识每一本书的书名，这三本应该是必选之作吧？

这座纪念碑和那些揭露法西斯暴行的文学作品，时刻在提醒我们，总有反人类者试图要将完整的世界撕成碎片，而《本草环球记》《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和《400个环球艺术之旅》则分明在昭示，已成整体的世界不会轻易地被粉碎。

“丁景唐研究丛书”三种，分别为《丁景唐诗集(1938—1949)》《丁景唐编辑文艺刊物(1938—1946)》和《丁景唐文学评传(1938—1949)》。由老丁哲嗣丁言模所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翻阅着厚厚的三部大书，睹物思人，感慨万千。

丁景唐先生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学生运动。那时候他是一个父母双亡、靠姑母抚养的穷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从中学到大学，从追求进步到投身于革命实际工作。他喜欢文学创作，钟情于编辑文艺刊物，如果没有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他可能成为一个思想进步、颇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最有可能的，是成为像叶圣陶、夏丏尊那样的新文学作家兼资深编辑，或者像赵家璧、李小峰那样的出版家、编辑家，造福于新文学事业。但是因为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他奋起投入救国运动，年纪轻轻，周旋于上海沦陷区的几个教会学校和教会组织之间，领导学生运动。然而天性爱好文学，他启发学生觉悟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文学创作和办文艺刊物来唤起学生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走上革命之路。当年与他一起工作的许多战友、合作者、莘莘学子，后来都走上了实际的革命道路，有的献出了生命，更多的则在新政权建立后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或领导干部。他们之中直接参与文学创作并显露才华的并不多，但文学艺术确实浸润过他们革命、浪漫的情怀付诸于实际工作。丁景唐先生在1946年因为身份暴露一度流亡他乡，但他没有放弃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一路采风编辑民歌、研究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还公开出版了那些成果。我读着这三本研究系列著述，跟踪着前辈走过的漫长岁月，心里却不断地疑惑着，感叹着：丁景唐先生如何能够将个人习性嗜好与严酷历史环境看似绝不相容的两个对立元素，如此无缝对接起来，取得了积极的美好的结果。我觉得这几乎是一种功德圆满的道德呈现。

当然，这只是我在阅读这三本书过程中的恍惚幻觉。在事实上，青年丁景唐的文学梦并没有那么圆满地实现。证据之一，也就是这三本研究系列所揭示的：丁景唐青年时期所编辑的文艺刊物，不管用了宗教还是校团的旗号作为掩护，都没有能够长期办下去，都是初战告捷而便旗息鼓，并没有产生长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沦陷区，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编刊的才华都像是长夜烟火，没有得到充分的施展。1949年以后，丁景唐十几十年担任上海宣传口的领导工作以及出版社社长，在文艺编辑这一领域做出了骄人业绩，但他的文学创作才华依然没有得到发挥，一腔激情写诗的诗笔终而未成，学术开拓的犁，他写出了研究鲁迅、瞿秋白、左联五烈士等一批成果。也许是著名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出版大社社长的身份遮蔽了曾经的上海沦陷区诗人的身份，以至于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大量诗文没有引起新文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也没有进入沦陷区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除了诗集《星底梦》以外，其他创作几乎被淹没不闻。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掀起新一波的史料整理高潮，关于上海沦陷区文坛、孤岛文学，以及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文艺等，都不乏有人研究和整理出版，老丁自己也在出版界策划过许多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选集，但是，我在书中却读到丁言模写的这么一段话，忍不住生出苦涩之感。他写道：“父亲是以‘歌青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沦陷区文坛的，处女作是一本薄薄的自费出版的诗集《星底梦》。父亲晚年流露出些许遗憾，因为70多年来从未有机会重新出版一本完整的《星底梦》。”（《丁景唐文集（1938—1949）》后记）

《丁景唐文集（1938—1949）》后记）据梳理，《星底梦》在1945年以“诗歌丛刊”的名义自费出版，收录诗选29首（准确地讲，应该是31首，其中《桃色的云絮》包含了三首小诗：《夜雨》《朝露》和《阳光》）以及相关序跋、附录等文章。后来一直没有重版。1986年，诗人周良沛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策划的“诗珍珠诗丛·新诗韵沉”丛书问世，内收《星底梦》。新版《星底梦》因体例所限，抽去了13首，只剩下18首，还删去了原版的两篇序跋。丁先生可能对对这个版本不甚满意，特意写了一篇“备忘录”（《星底梦》的出版本和重印本），着重强调：重印本的诗目“未经我过目，代表选者的眼光，并不代表本人的选诗标准”——这些“备忘录”都是丁先生随手写下的短文，仅作备查用，不曾公开发表，现在经过言模兄的整理，都以附录形式收录在研究系列中，这样我们得以了解丁先生为何为“70多年来从未有机会重新出版一本完整的《星底梦》”感到遗憾了。言模兄这次也终于有机会整理出完整的《星底梦》的新版本，连诗选全部收入《丁景唐诗文集》，这是丁先生在天之灵应感到欣慰的。从《星底梦》的出版故事中，我想引申出一个令人感怀的话题：丁先生在天国居高望远，思考之手有这么多出版问世，为什么他自己喜爱的一本薄薄的新诗集，就无法在他生前以满意的形式得到重版？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我觉得除了丁先生本人严于律已外，其政治身份、社会角色的转变以至于造成早年创作成果的遮蔽，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我在上世纪80年代曾系统读过丁先生的文艺创作和编辑的文艺刊物。那时候我与丁言模合作，打算撰写一系列现代编辑学研究的系列文章。第一篇是写吴朗西先生的编辑生涯，第二篇就计划写丁景唐先生，我们一起在图书馆查阅旧报刊，翻阅了全套的《女声》杂志以文化与历史有了更丰富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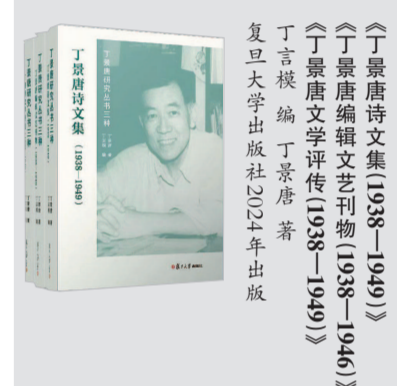
读丁言模编『丁景唐研究丛书』

# 犹恋风流纸墨香

■ 陈思和



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丁景唐诗文集(1938—1949)》  
《丁景唐编辑文艺刊物(1938—1946)》  
《丁景唐文学评传(1938—1949)》  
丁言模 编 丁景唐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及丁先生主编的刊物如《联声》等，搜集了先生的早期诗文。我第一次被丁先生早期诗作所打动的，不是《星底梦》里的诗篇，而是像《远方》《一个以色列民族英雄的死》等借用宗教题材暗喻反法西斯斗争的长诗，这在沦陷区文学里是很少见、却有特色的，值得从文学史角度给予充分肯定。我们写成了一篇两万多字篇幅的长文《希望之孕——记丁景唐编辑生涯五十年》，发表在1992年的《新文学史料》上。我现在也记不清了，这篇写于1987年的稿子怎么会积压五年之久才发表出来。大概就是因为发表不顺利吧，我与丁言昭合作的计划就此松懈下来，后来我们都转移了学术研究的兴趣，我偏重于文学史理论的关键词研究，丁言模偏重于传记写作，都没有把丁景唐先生在沦陷区的诗文创作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这当然是有点可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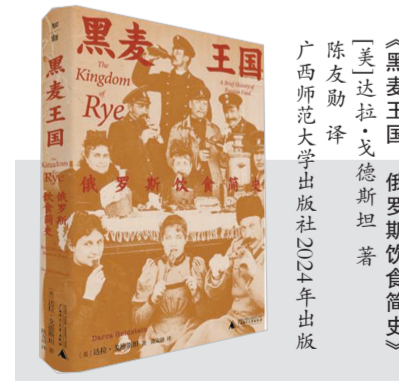
现在已经进入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离我们写《希望之孕》也有30多年。丁言模兄怀着对父母的纯孝之心，沉浸在研读父亲生前留下的大量“备忘录”的片言只语之中，潜心于旧报刊旧文献之中，按图索骥，发掘许多不为人知的丁先生早期诗作作品。现在收录在研究系列的，有诗歌60多篇，各类文章百余篇，还有许多应用文（宣言、启事、公开信等），计40多万字。言模兄不仅把这些作品汇集编册，而且在细读丁景唐先生作品的基础上，考证辨析，写导读，做注释，补材料，添附录，使丁先生早期创作全貌得以完美呈现，其功德焉。阅读是《丁景唐诗文集》。在呈现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联系沦陷区的时代背景，细心解读刊物，尤其是丁景唐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文艺刊物和学生刊物，逐卷逐期介绍评价；丁先生是编辑大家，尤其是他后半生的编辑生涯，波澜壮阔，泱泱大刊，然而在上世纪40年代前编的刊物，像一道道溪水清流，汇合前行，百川归海，唯有两段人生结合起来，才能呈现丁先生完整的编辑生涯。——是期为《丁景唐编辑文艺刊物》。在呈现早期丁先生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的基础上，言模兄再攀峰峦，对丁先生早期人生进行深入追踪和探索，进而探索上海沦陷期间中共地下党的各种活动、学生运动的方方面面，以及他父母居住上海西区的各种人文景观。——是期为《丁景唐文学评传》。三种研究系列，三个书写视角，分别在创作、编辑、人生三大领域各有侧重，相对独立，联系起来又构成一幅整体性的巍峨叠翠的群峦之图。

“丁景唐研究丛书”，每一本都是沉甸甸的厚重之书，每一页文字都浸透言模兄的思念之情。他似乎是要以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来证明，他能够担当起“子承父业”的重任，他要以自己的工作实绩来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关于这一点，读者只要读一下这三本研究系列的“后记”，即知我所言非虚。我读这三篇后记，非常感动。我想，丁先生确实可以笑慰后继有人了。

三味书屋

# 从黑麦开始，探寻俄罗斯饮食文化的变迁

■ 麻潘妍



前，砖砌炉灶一直是俄罗斯人世代使用的传统炊具，烘焙、烘烤、蒸煮、煎炸，多样的烹饪方式，造就了丰富多样的俄罗斯传统美食。酸味的黑麦面包、发酵黄瓜、罗宋汤，或是酸甜味的蜂蜜炖洋葱（“沃茨瓦”），不仅体现了俄罗斯人明确的口味偏好，也是俄罗斯饮食中永恒的部分。

在俄罗斯习俗中，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始终遵循着热情的待客之道。作者通过文献记载与亲身经历，向读者详细描述了俄罗斯人的好客风俗。地广人稀、极端天气和经常无法通行的道路，使得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感中，包含着根深蒂固的热情好客与社交喜好。

对于沙皇、贵族等上层社会人士，他们的热情好客往往表现为慷慨，且越戏剧化、越公开，从中获得的快乐就越大。比如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将餐厅装饰为古罗马风格，主宾都按照古罗马的宴会礼仪就餐，以及在吃饱后用羽毛挠喉咙催吐，以便享受其他美味佳肴。18世纪末出现了“开放餐桌”，无论是否受邀，是否认识主人，只要与主人同阶层，就可以不请自来。每个客人都能享受精致的餐食，都能吃到丰盛的美味佳肴，甚至每个客人都能有单独的仆人为其服务。而这种

奢靡的背后，是随时待命的大批农奴。

比起摆满蜡烛与鲜花的贵族餐桌，更多的是农民家中摆着一锅菜汤的粗糙木板。恶劣的自然条件经常导致粮食歉收，伴随着不适当的粮食分配体系，穷苦成为了俄罗斯平民生活的常态。但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俄国平民招待客人也会豪爽大方甚至不计成本，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节俭。十月革命后，大城市的人口集中以及集体公寓的尝试，让俄罗斯人奢侈的好客风俗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世界大战带来的物资匮乏更使他们无可分享，但他们在最艰难的时期里，也会想尽办法聚在一起庆祝特殊日子。

冷战影响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俄罗斯饮食也不例外。苏联解体后，几种不同的连锁店派系出现在俄罗斯的餐饮市场，它们多是主打高端的外国美食，在世纪之交的激烈竞争过去之后，受意识形态影响的饮食习惯向逐渐被直接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所取代。而近年来民族主义抬头，许多本土化餐饮开始在俄罗斯兴起，正如弗拉基米尔·穆欣2016年在荷兰前卫美食节“厨师革命”上宣称的那样，民族文化才是美食发展的未来。“有机”的“民族”构成了俄罗斯餐饮界新的潮流。厨师们让古老的食谱复活，把

它们改造成新的形式，但即使是在最具前瞻性的菜肴中，那些基本的俄罗斯口味也保持不变。

本书作者达拉·戈德斯坦是美籍俄罗斯人，她的祖父母在20世纪初离开了俄罗斯。小时候，她的祖母常做甜菜汤、酸叶菜汤和卷心菜包肉等俄罗斯菜肴，这些菜肴的风味构成了作者对俄罗斯的最初概念。后来，她不仅回到了俄罗斯，还在当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尽管冷战使她的工作面临困难，但俄罗斯人民的热情好客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与俄罗斯饮食文化的联系逐渐加深。而本书的诞生，也正是源于她从小开始的跨文化的理解与体验，以及像多数移民后代那样对母国的情结。在书中，我们也能看到许多跨文化视角的表达，其中不乏异于普通中国人对俄罗斯认知的内容，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

哈佛大学研究食物与文化的华琛教授认为，通过食物这个“透镜”，可以观照社会、文化特征及其变迁的所有方面。俄罗斯人的饮食文化在其社会建构与变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作者以食物为媒介，揭示了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让人们对于这片广袤土地的文化与历史有了更丰富的了解。